

如何把“学术争鸣”呈现给公众

□ 临风

近日,一场关于北京PM2.5来源的争论,引起了关注。先是媒体报道了一篇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大气化学与物理学)的论文研究结果,称汽车尾气对北京PM2.5的贡献只有4%。很快,有关研究机构就以一场“新闻通气会”的形式,对这个研究结论进行了“评议”,强调该论文有种种“研究缺陷”,大多数研究认为机动车对北京PM2.5的贡献在20%-30%。各媒体也纷纷以“4%被严重低估”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一场“舆论风暴”似乎平息,各方都松了一口气。

PM2.5已经成了搅动公众神经的“敏感词汇”,与之有关的研究结果发布往往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几个月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发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称,“雾霾令北方人比南方少活5年以上”。对这些听起来有些“雷人”的科学研究成果究竟该如何解读和传播,确实是摆在新闻媒体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面对这些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关心的只是结论,除了学术同行,没有谁会翻出论文原文细细研读,那些复杂的公式、方程

和模型也不是一般公众所能看懂的。

在我们这个公众科学素养还普遍偏低的国家,对科学研究“权威性”的认知出现了“分化”。对转基因这样的问题,任凭科学家如何解释,公众仍是将信将疑;对PM2.5这样的问题,科学家的研究结论却被不断放大甚至过度解读。以至于为了平息公众的疑虑,不得不采取“新闻通气会”的形式对学术同行的研究结论进行“评议”,这着实是中国科技界难得一见的“奇观”。

这次“非典型”的“同行评议”可能会暂时平息舆论,但是却对中国的“学术生态”造成了伤害。为了平息舆论,不惜越过“学术争鸣”的基本规范,面对新闻媒体对学术同行的研究成果“指指点点”。必须说明的是,这场争论不是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而是对一个公众关心的科学问题的“学术探讨”,如此做法,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更有甚者,为说明同行研究中“缺陷”,竟然抬出了“战略先导专项”课题组的“大轿子”,难道这个“战略先导专项”天生就具有比别“高贵”的“学术血统”吗?此时此

刻,所谓“自由探索”、“学术平等”,都已经被无情地踩在了脚下。

而国外对待与公众议题敏感的“学术争论”的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2012年,法国卡昂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物学》杂志上发表转基因玉米致癌论文,已成为部分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重要证据。但杂志出版方Elsevier公司2013年11月28日在美国宣布,由于进一步分析显示论文数据不足以支持其结论,因此决定撤回这篇论文。

Elsevier公司在声明中说,《食品与化学毒物学》杂志对所发表的论文及论文所报告的数据进行了彻底的、长时间的分析和,对论文发表的同行评议过程也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欺诈或对数据有恶意曲解的证据”,然而,“有理由担忧”论文所提及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的实验大鼠数量和类型。声明说,归根结底,论文的结果“尽管无不妥之处”,但是“没有说服力”,因此这篇论文达不到《食品与化学毒物学》的出版要求。声明还说,这篇论文发表后编辑部

收到多封来信,对论文描述结果的有效性、实验动物的合理使用表达关切,有些来信甚至称其中存在欺诈,多数来信呼吁撤回这篇论文。这些来信以及支持这篇论文的来信,都已和作者的回应一并发表。

有关PM2.5的研究,只是这两年来才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关于雾霾的成因和解析,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说有什么“一致性”、“多数人”认可的研究结论还为时尚早,那些听起来“雷人”的研究结果以后可能还会出现。所谓“科学理性地报道雾霾”,需要的是科技界、新闻媒体共同努力,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点和公众接受能力的科学传播方式,而决不能把“学术争鸣”作为平息舆论的“工具”。学术研究可以成为决策的有力支撑,但不能退化为屈从决策的“棍子”。

毋庸讳言,坚守“学术研究规范”的底线,是每一个科研从业者的基本道德要求,然而这个听起来很丰满的“理想”,现实中却实实在在地充满了“骨感”。



图/CFP

让主持人好好说话

□ 杨雷

继“限娱令”、“限广令”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再度出手,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节目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标准普通话。一道“普通话令”马上引发了两极化讨论,反对的人数居多,重点探讨了方言的文化多样性和独特魅力,支持者则认为新令可以屏蔽泛滥的“港台腔”,防止乱用英文单词现象。看似不存在对立面的观点在此起了冲突,大概由于大家对新令的解读角度不同。

关于方言节目,本无可厚非。方言代表了地域文化,传承千年,有的词句还保留着古语的用法,有的表达还包含着典故,不仅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还能建构一个地区人们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例如一些地方台的方言节目亲民接地气,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没有理由受限。

“限方言令”中所说的“节目特殊需要”应该指的是这些。至于“港台腔”和英文单词,就真正应该受限。明明是北方大陆土生土长的姐儿和爷们儿,非要往外蹦跶脚的英文单词,简直扰乱电视语言环境,让人反感。

上述两种情况总体好区分,不受影响的节目可以继续,该限制的语言表达要禁止。但是,当普通语言和方言有了交集,“不得模仿地域特点突出”马上引发了两极化讨论,反对的人数居多,重点探讨了方言的文化多样性和独特魅力,支持者则认为新令可以屏蔽泛滥的“港台腔”,防止乱用英文单词现象。看似不存在对立面的观点在此起了冲突,大概由于大家对新令的解读角度不同。

关于方言节目,本无可厚非。方言代表了地域文化,传承千年,有的词句还保留着古语的用法,有的表达还包含着典故,不仅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还能建构一个地区人们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例如一些地方台的方言节目亲民接地气,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没有理由受限。

“限方言令”中所说的“节目特殊需要”应该指的是这些。至于“港台腔”和英文单词,就真正应该受限。明明是北方大陆土生土长的姐儿和爷们儿,非要往外蹦跶脚的英文单词,简直扰乱电视语言环境,让人反感。

电视节目的根本属性还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得益彰。如果电视节目形态能够被广泛接受且无伤大雅,那便代表了大众的一种文化选择。顺应了一个时代的产物,会有自己的生存淘汰之道,本不应受到太多限制。不过,对已经遭到公众普遍反感的“怪腔怪调”发红包,倒是值得提倡的限制——辅助性加速“净化空气”。

说到底,不管是方言、普通话,还是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广电总局来定“限方言令”的真谛,应该在于让主持人做真实的自己,好好说话。

请多给转基因一点耐心

□ 曹丙利

近日,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正在研究转基因水稻,认为转基因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不能一概而论。这一消息被多家网站以“袁隆平力挺转基因”等为标题广泛转载。继崔永元与方舟子的“骂战”之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再次引发热议。

作为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这一表态似乎为支持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一方增添了砝码。然而,袁隆平其实一直坚持“转基因水稻研究要抓紧,推广要慎重”的观点,在转基因安全的问题上最多也就是“中间派”。因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至今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相信任何一位理性的科学家都不会贸然断言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

在某网站进行的调查中,100%的消费者都选择了“对转基因安全性将信将疑”这一选项。消费者之所以会如此深度迷茫,是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转基因安全论战自始至终未能厘清“推进转基因研究”与“推广转基因食品”的界限。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研究的“笃定”支持,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成为“疑云”。

转基因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这一“疑云”时耐心的缺失。一些科学家的过度自信与公众的盲目担心,将导致对待转基因的态度进一步偏离理性的轨道。也许专家与公众的态度互换才更为科学。作为专业的研究人员,应该对需要经过上百年以上时间检验才能确定其安全性的转基因食品始终抱着小心的谨慎的态度。而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不必过度敏感,该“虎”色变。要相信大自然经过千万年的进化,最终会“物竞天择”。

呼唤科研人员基于“最坏的可能”在科研伦理约束下开展转基因研究,公众基于“最美好的想象”给予适度的理性包容,而媒体则需要基于科学知识进行良性引导。正如丹尼尔·查尔斯在《收获之神》一书中写到的:“与大多数人类活动相比,农业对谦虚、忍耐这样的旧道德的要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术的潜力时需要谦虚,期待公众接受时更需要耐心。”

请多给转基因一点耐心。

疫苗接种不能因噎废食

□ 尹传红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食品安全事件的“考验”,还有诸如转基因这样的安全“不确定性”困惑,公众的“安全”神经似乎已变得愈发敏感、脆弱。这不,岁末年初,明显疫苗恐慌又来了。

这边厢,官方刚刚通报:2013年12月13日至31日期间,各地报告的17个接种深圳康泰乙肝疫苗后死亡的病例,死因各不相同,明确或初步判断,与其接种疫苗无关。那边厢,10省份的免疫规划内疫苗接种率应急监测显示,最近1个月,乙肝疫苗的接种率下降了30%左右,其他疫苗的接种率则平均下降15%。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权威机构围绕此次“疑似乙肝疫苗致死”事件所做的一个调查表明:有将近30%的家长对预防接种产生了犹豫的心理,另外有20%左右的家长不想带孩子去接种疫苗。已有专家对此表示忧虑:如果上述状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在一些地区出现免疫规划疫苗所针对的传染病流行,也不排除出现(疫情)暴发可能。特别是,公众对国产疫苗质

量失去信心,不去接种疫苗,会导致几代人努力建立起的人群免疫屏障“失守”。

应该看到,疫苗和其他药物一样,不能排除其副作用和意外风险;接种不良反应,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不过,总体来看,疫苗的不良反映终究属于小概率事件(虽然对于不幸降临的家庭来说,即便百万分之一概率那也是百分之百的损失和伤痛),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何况也要看到,面对基数庞大的接种人群以及复杂的产业链条,判断一种疫苗跟疾病或死亡是否存在关联,除了时间上的关联之外,还要考虑生物学合理性、关联特异性、关联强度、关联一致性等等因素。

其实,近年来,由于误解、误读和反应过度等所导致的疫苗恐慌事件在国外也时有发生,甚至引发过公共健康安全危机。例如,接种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疫苗加大了儿童患孤独症(自闭症)几率的说法,在欧美国家一度就弄得人心惶惶,事后证明这完全是掺杂了研究者私利和存在欺骗行为的无稽之谈。

如何与比邻而居的“陌生人”相处

□ 卢阳旭

最近,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因接连发生的“泼粪”、“放狗”、“鸣枪”甚至“钢珠爆头”等一系列极端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以一种让人揪心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即我们该如何与比邻而居的人们相处?

比邻而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居住模式,人们似乎对之再熟悉不过。但姑且不论熟知未必真知,一个必须认识到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我国快速的社会变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虽然还是比邻而居,但早已形同陌路。

认真观察不难发现,在对这些事件的讨论中,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即这些冲突既没有发生在农村社区,也没有发生在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单位社区,而基本上都发生在新的商品房小区。显然,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

在快速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走出了被称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和单位社区。在新的地方,一群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地比邻而居,共同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对于与自己同住一栋楼、一个

小区的邻居们缺乏了解,甚至缺乏去了解彼此的兴趣。此时,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走出在其中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熟人社会后,一群陌生人在一个新的地方该如何比邻而居?

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美化、诗化熟人社会,又不认为“倒回去”的办法能够解决新问题。当下,我们要弄清楚的首要问题是,新问题究竟是什么?一定意义上说,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弱化甚至完全褪去了基于特殊性原则的人情、面子、社会关系对人们互动的调节和约束,更多地依靠一般化的、抽象的,但也更加平等的权利主张、程序规则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事发之后,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其他公众,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我们很难对各种道理做绝对的先后排序。我们相信,在冷静下来后,一个正常人不会不知道被调震天响的音箱会打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泼粪、放狗,以至直接的暴力袭击会损人尊严甚至伤人生命。我们也相信,人们会认可这样的观点:每个人都享有跳舞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每个人也有享受安

静的自由和不受打扰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一般的大道理上,而在如何把大家都认可的大道理“小而化之”。在面对与我们比邻而居的人们时,我们做到既尊重一般的、抽象的大道理,又重视把它们具体化,让它们接入日常生活的“接地气”。说穿了,自由和权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

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有人认识到重点应该补充上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短板,在居民小区之外兴建更多的公共活动场所,在满足广场舞爱好者需求的同时,以疏导的方式把广场舞“请出”小区。与此同时,应该对广场舞的时间、地点、音量的分贝数等进行更明确的规定。就具体而言,这是解决“广场舞”变“广场舞武”的重要措施。但也必须承认,它们没有触及更根本性的问题,即人们到底该如何比邻而居——特别是陌生人社会上的比邻而居问题。不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下真功夫,趟出一条新路来,我们会把下葫芦浮起瓢,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当我们奔跑在城镇化的道路上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建设,又踏实地进行了客观、准确、充分的数据积累和数据工作体系建设的政府;

二是控制着数据源头、掌握着数据采集分析技术的公司,如:谷歌、亚马逊、高德纳,以及迎头赶上前位波段的商业公司,如:苹果、MOOCs、果壳……

三是一切有数据意识、能够找到思路和方法,具备数据素质,并敢于行动的个人和组织。比较遗憾的是,对于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从各级政府到组织到个人,仿佛每一步都落后几拍,都在看别人的风景,或者连风景都不曾感受得到。我们仿佛一直在跟风炒概念、被动学知识,而不曾去领会概念和知识背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

当别人在努力进行数据积累和数据工作体系建设的时候,我们的各级政府却在为政绩而修饰或篡改数据;当别人建设透明和开放的数据工作机制的时候,我们却在为坚守自己的部门利益而使社会成为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当别人在论证建设全国免费无线网络的时候,我们的管理部门却在论证WiFi收费、微信收费……

与历史科技革命相比,我们在技术方面从未离前沿如此近过,但在社会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却相去甚远。中国是潜在的数据大国,但也要成为数据强国却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如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的维克托在《大数据时代》中所言:“变化来得迅猛,人类没有时间适应,大概可能只有几年的时间。”这无疑应该成为当今国人思考和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大数据时代谁是赢家

□ 范春萍

大数据时代汹涌而来

相信许多人都对2009年美国暴发H1N1猪流感有印象,世卫组织宣布,在美国和墨西哥暴发的人感染猪流感疫情构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经过2003年SARS惊吓的国人第一次听说“猪流感”这个名词时表示了担忧,却不知道那样来势凶猛的疫情后来为何不了了之了。

2013年出版的《大数据时代》一书解开了大家心中的谜团,原来是数据技术帮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忙。Google公司以其公共互联网搜索数据及其发明的数据预测模型,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传统流行病学调查最少两周才能完成的锁定流行病传染源和传播路线的工作,为扑灭疫情赢得宝贵时间。

还有一件带来震撼的事件,就是2013年比特币冲击。一些人惋惜错过了楼市又错过了比特币,一些人高傲地“鄙视”跟风炒作行为,却不知比特币掀起的楼市风潮或为赚钱而炒作那么简单。尽管它几乎不为世界上所有政府所欢迎,但却是一个革命性新生事物,具有挑战现行金融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类知识体系的潜能,是大数据时代来临的代表作之一。

如今,从科研、文化、教育到生产、商业和政治生活,不经意间仿佛都已被大数据笼罩,甚至出现了数据霸王取代粮食、石油霸主掌握世界的趋势,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

然而,大数据对于未做好准备迎接它的到来的落后或欠发展社会而言,却绝不是锦上添花,不是可以拿来使用的工具,它是我们需要应对的一个时代处境。

大数据时代缘何而来

所谓大数据时代,可以这样理解:数据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现象,对生产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和重要资源,成为创新的源泉;数据技术量化工作,为不可捉摸之经济、文化、社会等价值的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诸如隐私、自由、人权、安全危机。大数据时代所孕育和助推的,是一场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大数据时代是信息时代的升级版,是信息技术发展和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共同结果。数据存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数据呈现、云计算、物联网、机器学习等一系列技术进

步,使大数据的价值得以呈现,大数据的世界得以建立。然而,包括信息文化、信息制度在内的社会信息化建设却是孕育大数据时代温床。

可以回顾一些时间节点:1938年克劳德·香农首创信息论;1946年人类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诞生;1955年美国人提出“信息自由法”,1965年获得通过;1974年美国信息和工业化协会长保罗·泽考斯基提出信息素质概念;1980年阿尔温·托夫勒出版《第三次浪潮》提出“信息社会”概念;1993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8年美国全国图书馆和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制定美国中学生信息素质标准;2009年1月奥巴马上任首日签署包含“政府应该是透明的”“政府应该是参与性的”“政府应该是多方协作的”3点宗旨的重要文件《透明和开放的数据》,到2013年世界大数据元年。

大数据时代谁是赢家

曾经有一个说法:谁掌握了粮食谁就掌握了世界,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握了世界。面对大数据时代,有人断言,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世界。大数据时代,谁又是数据霸王,数据宽儿?笔者以为,应该是如下三类机构、组织或个人:一是做了较为充分的社会民主化、信息化